

我国财政政策的路径演化与效率检验^{*}

——基于改革开放 30 年来微观经济数据和经验

杜 云¹, 周红刚²

(1. 厦门大学 财政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 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自凯恩斯以来,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在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 对我国财政政策的路径和绩效进行综合性的分析, 显然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和政策优化。文章考察了 1979—2007 年的大量宏观微观经济数据, 并基于财政政策要素组成的数据特点, 采用结构性的 VAR 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模型, 以实证的方式解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路径演化和动态效应。

关键词:改革开放 30 年; 财政政策; 协整检验; 脉冲响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 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01-0086-11

一、财政政策的演化路径

虽然西方学术界主张财政政策的中性原则, 但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理论的影响却极为巨大, 完全放弃或者大量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此类似的是, 政府总是想着推行若干新的财政政策, 并在各个时期凸显出其经济意图。

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市场经济基础较为成熟, 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似乎显得既高效又轻盈,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的财政政策和由此决定的政策效率却大不相同。前里根—布什政府以供给学派思想为政策基础, 其财政政策中尤为主张私有制市场机制, 建议政府只是调控, 更多地让位于市场。由此, 政府公共开支减少, 基础设施和规模企业投资全面下降, 经济竞争力减弱, 失业率上升, 出现若干社会问题。而其后的克林顿政府则以全面干预和调控经济的姿态出现, 其财政政策果断转向, “重振美国经济”成为财政政策的目标。显而易见, 只有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克林顿政府才能成功扭转赤字和经济颓势, 使美国经济走上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高速发展道路。

在我国, 财政政策一样具有非凡的意义。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目前我国基

收稿日期: 2008-09-12

作者简介: 杜 云(1970—), 男, 江西安义人, 厦门大学财政系经济学博士, 副教授;

周红刚(1970—), 男, 江苏徐州人, 厦门大学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高级工程师。

本确立市场经济地位,历经 30 年。在此期间,财政政策历经若干阶段式的跨越或转向,并日趋形成一个独特、成熟、有效率的政策演化路径。

1979 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政策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拉动的影响,社会需求高度膨胀,物价随之较快上涨,财政赤字同步急剧扩大,引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扩张性财政政策被迫于 1985 年向紧缩型财政政策转型。而时至 1998 年,在 10 多年的政府紧缩调控之后,相对过剩和通货紧缩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问题。为摆脱经济萧条,财政政策再度扩张,积极财政政策成型。此阶段中我国经济呈现健康、快速增长态势,积极的财政政策及政策效率被政府和大多数学者所认可。至 2004 年,稳健的财政政策被提出来,试图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等若干问题。显然,这一财政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纲领中,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都是重要而客观的,并显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正确认识和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多目标的实现,是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政府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时至今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这样一种呼声:由于微观经济中市场机制运行基础不好,企业因此而缺乏活力,总想着依靠财政政策或货币和产业政策来刺激经济,以实现繁荣^①。这些行为或观点一旦形成气候,那将是灾难性的。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是财政政策实施的原则和前提,我国的经济调控不仅有财政政策,而且有货币、产业等若干政策辅佐,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和融合,必须是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的均衡点的发现。事实上,从我国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曾发现:一旦长期实施或依赖某一财政政策,就如同药物依赖一样,无法摆脱。如此看来,必须从动态的角度全面审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否则,对财政政策的误用和滥用,不但会损害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破坏政府的名声。

我国的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效率,这是学者和政府都密切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改革开放 30 周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对那些即便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财政政策,其绩效和定量评估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政策要素上来讲,我国的财政政策,一直是紧密围绕财政收支、GDP、国债发行量、通货膨胀以及社会需求而展开的,而本文正是希望借助 30 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财政政策的路径演化进行一个数理分析,并基于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经验,提出一些理论上的看法。

二、财政政策的效率检验

1. 技术路线。虽然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不一,例如,在约束型经济中,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调节供给或需求而影响经济增长;在开放经济系统中,财政政策借助对外贸易及 FDI 这两个中间变量影响经济增长;而在内生

经济增长模型中,财政政策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R&D 等变量影响经济增长。在本文中,这些影响机制可以被视为假设,也就是说,研究模型将设定多个变量,充分揭示和反映财政政策与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由此,本文采用协整分析方法(VAR)。

方法及因素变量的选取。在已有的一些研究中,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中或采用传统的 IS-LM 模型,或采用联立方程宏观计量模型。而本文将秉承西蒙斯(Sims)的 VAR 研究方法,对大量数据分别进行动态效用分析,其数据分类、指标选取是关键。其中,经济增长率(GDP 增长率)理所应当成为因变量。应该说,我国各阶段的财政政策的调控核心就是围绕 GDP 增长率是否实现而展开的,本文选取 GDP 增长率,作为基础因变量指标。

解释变量的选择,必须考虑财政政策的组成。显然财政支出和国债发行量是必不可少的变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现有的研究中,财政支出和国债的动态分析几乎没有。然而,实际上财政政策中的一个核心组成就是国债发行量,尽管我国重启国债发行始于改革开放前几年(1981 年),即便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我国的国债发行量总体不高,但发行量却增加较快。于是,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分别为:财政支出增长率(F_t)、国债发行增长率(D_t)。

进一步考虑我们的约束型经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分别为:消费支出(C_t)、税收增长率(T_t)和通货膨胀率(r_t)。

2. 回归检验。根据上文定义的变量,我们先选取 30 年来的样本数据^②,计算得到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若干指标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GDP 与财政指标的相关系数

应变量 GDP 与 各解释变量关系	财政支出 F_t (Π_1)	消费支出 C_t (Π_2)	国债发行量 D_t (Π_3)	税收(税负) T_t (Π_4)
GDP(Π)	0.9526	0.9313	0.9419	-0.425

表 1 中,以经济增长量 GDP 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简单回归模型:即 $\Pi = \alpha + X_1 \times \Pi_1 + X_2 \times \Pi_2 + X_3 \times \Pi_3 + X_4 \times \Pi_4 + e$;其中 α 是截距项, X 是待估回归系数, e 是随机误差项。利用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为:

$$\Pi = 0.39518\Pi_1 + 0.21522\Pi_2 + 0.0296\Pi_3 + 0.16302\Pi_4 + e$$

$$(1.78369) \quad (1.42538) \quad (1.46821) \quad (0.74133) \quad R^2 = 0.46985$$

从回归结果可直观看出: $R^2 = 0.46985$,说明财政政策只能解释 46.98% 的经济增长,但是仍然可以从回归结果的参数分析中作出一些直观上的判断。例如:财政支出增长率系数为 0.39518,且 T 统计量为 1.78369,说明财政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消费支出系数为 0.21522,T 统计量为 1.42538,似乎印证和说明了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宏观税负系数为 0.16302,T 统计量为 0.74133,说明 30 年来,尽管税收与 GDP 的相关系数为负值(-0.425),但是在数据回归检验中,税收政策总体上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是正面的,宏观税负的提高仍然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③。此外,国债收入增长率系数为 0.0296, T 统计量为 1.46821,表明国债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

上述回归检验虽然不能给予理论上的充分解释,但是其一些参数意义的价值仍然较大,至少可以得出趋势上的判断,并据此计算得出各变量相应增长率指标与趋势值随时间变化的相关图,参见图 1 至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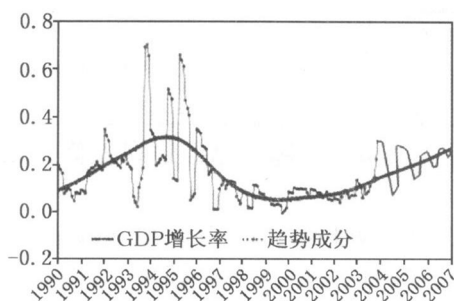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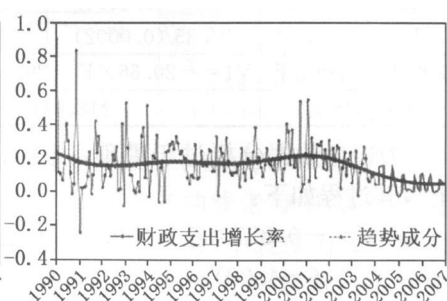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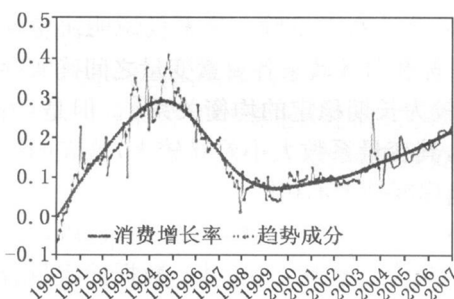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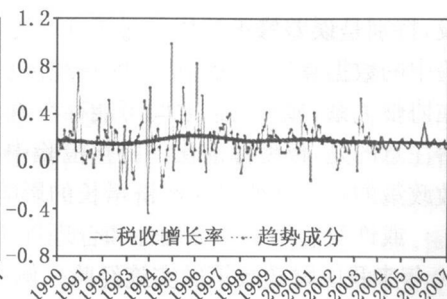


图 1 (V) GDP 增长率

图 2 (F_t) 财政支出增长率图 3 (C_t) 消费增长率图 4 (T_t) 税收增长率

3. 协整检验。在 VAR 检验思路必须考察各变量的平稳性,以避免“伪回归”的出现。本文预先采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即 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方法,加入 (C, T, K) 检验,也就是各变量的原序列及一阶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相应结果表明:(1)各变量的原序列均存在单位根,都是非平稳序列;(2)各变量都是单整的 I(1) 过程。

然后进行协整检验,这里有必要先确定协整的最佳滞后阶数。通过逐一测试滞后阶数 L 从 0 到 2 相应的各检测值^④,确定在 1% 的显著水平下,3 个 VAR 模型的最佳滞后期均为 2。

过程无需赘述,直接使用 Johansen 极大似然值方法对多个变量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分别按照各解释变量财政支出、消费支出、国债发行量、税收增长率与财政政策目标进行配对建立 VAR 模型,然后分别计算模型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最终分别确定 F_t、C_t、D_t 和 T_t 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在协整关系。经计算分别列出 F_t 、 C_t 、 D_t 和 T_t 的 Johansen 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F_t 、 C_t 、 D_t 、 T_t 与各解释变量间协整关系 Johansen 检验表

样本:96;观察值:95;滞后期:2					
原序列	特征根	迹统计量 (P 值)	1%临界值	λ -max 统计量 (P 值)	1%临界值
F_t	0.3289	45.54 (0.0027)	64.39	28.79 (0.0009)	37.57
C_t	0.2355	75.52 (0.0005)	53.37	40.85 (0.0005)	35.70
D_t	0.1341	64.80 (0.0006)	54.68	41.24 (0.0005)	20.72
T_t	0.0358	24.35 (0.0002)	9.74	40.85 (0.0004)	9.55
标准化后协整方程	$V1 = -20.66 \times F_t - 29.05 \times C_t + 0.0796 \times D_t + 2.2056 \times T_t$ (其余略)				
LR 似然比	118.14; 82.37; 63.69; 6.58				

为避免数据分析过于繁琐,表 2 中实证结果实际上已经过误差修正处理^⑤,其过程如下:

$$\Delta V = -0.027 \times \Delta F_t - 0.023 \times \Delta C_t + 0.004 \times \Delta D_t + 0.007 \times \Delta T_t$$

$$(-4.02) \quad (-2.23) \quad (0.39) \quad (0.25)$$

$$R^2 = 0.6021 \quad \text{Adj. } R^2 = 0.2655 \quad \text{AIC} = -0.0028 \quad \text{SC} = -0.0035$$

从检验初步结果看,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而接受备选假设,特别是误差修正项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不仅说明协整检验中的数据真实、平稳,更表明在经济目标和财政政策各要素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显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较为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模型标准化的协整检验中,其变量系数大小差异较大,这表明财政政策的各要素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大不相同的。

或许我们模型的准确性和合理性不仅可以用上述检验来证明,也可以用 30 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经验来侧面证实。也就是说,基于数据的定量分析和基于经验的定性分析显得同样重要。一般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逐步的。多数学者认同对于经济的冲击,首先是税收,其次是政府支出,之后再逐步体现国债发行的市场影响。这些财政政策要素的实施,在现实经济中既体现为消费支出的变化,也体现为需求和物价的多重波动。显然,本文的协整检验进一步强化和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在财政政策组成要素中,各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也可能持续,其具体的影响方式和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三、数据分析和评价

由于已经作出 VAR 协整检验,因此,基于经验和数据的综合分析,可以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出一个深层次或较为关键的分析和评价。

1. 基于图形层面的要素分析。根据已得到的 VAR 数据,建立脉冲响应函数,以分析财政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由于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已成为历史和

现状的我国财政政策的转变期,因此特别要进行某些特定年份和阶段的数据分析^⑦。如图5所示,图5中的横坐标为时间,即脉冲响应函数的时间序列均限定为24个月,而纵坐标则表示一个单位的财政政策要素变量的冲击对经济因变量产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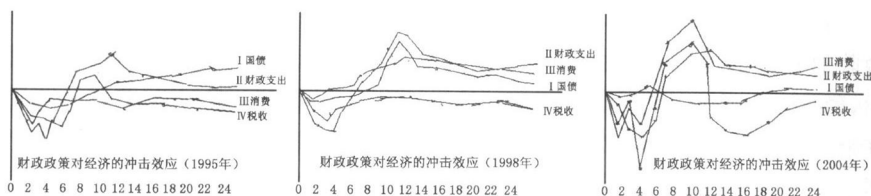


图5 财政政策对经济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1985年、1998年、2004年)

首先考察国债影响力(I曲线)。相比较而言,在各曲线走势中,国债发行冲击脉冲响应曲线的走势最为平稳,并在各个阶段(年份)中表现为较长期有效,即便是在国债发行量和发行增长率比较平稳的1985年前后阶段也是如此。三小图均反映出,国债脉冲响应力度初始并不大,从各响应函数图看,几乎在6—7个月的短期时间内几乎无影响。但是在6个月之后,国债发行脉冲响应明显放大,并且力度逐渐趋大呈现正响应。这个图形显然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国国债发行初期似乎有着某种挤出效应,但是伴随国债的平稳认购和转为政府公开市场业务之后,其对经济的影响和信号便逐渐并保持为正效应。并且,这一效应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初始阶段表现明显(1998年),而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进入后期(2004年)一度为负效应。这些表现确实与我国国债政策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即在1994年以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国债的发行政策稳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是,伴随国债发行力度的加大,当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出现一定问题时,也会降低国债对经济的冲击影响力。

其次,比较财政支出曲线的各阶段变化。发现各阶段中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冲击最为显著,其冲击时间和走势在三个阶段中横向类似,但纵向却有着较大差异。横向比较中,各阶段,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冲击初始时期力度均较大,在8—12个月左右时期有达到最高点的迹象,之后冲击力度开始下降。但是,财政支出曲线即便是在12个月之后,也就是说,在上一年度的冲击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并不消除,而是在其后将保持一个平稳的力量继续冲击。而从纵向比较则明显看出,紧缩财政政策时期(1985)的曲线走势较其他阶段平稳,在较长时期之后甚至表现为抑制作用,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竟然低于国债曲线(图5中的第一小图),在2004年的第三小图中,却表现出高于国债而低于消费的冲击效应。但是,三个阶段中,财政支出对经济冲击的效应均能定性为正值。更进一步,将数据扩展到48个月,72个月,乃至改革开放30年,都似乎可以得出一个趋势性结论,那就是我国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驱动表现

是一贯性的,几乎没有周期反复性,即便是在紧缩财政政策期间也是如此。这样,综合了三个阶段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再次印证了我国财政政策在进行阶段性跨越和转向时的有效性,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李嘉图等价命题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几乎不成立。

再次考察税收要素。作为财政政策调控的最为便利和普遍应用的工具,税收对经济的冲击效应也一直被经济学家所关注。在图5中IV曲线反映出,税收在对经济的短期冲击方面,在各阶段均表现迅速而有力,且这一冲击在财政税收政策实施后2个月内就有明显表现,即便不考虑政策的时滞性,也似乎可以认为这是瞬时反应。然后,在6个月左右或将达到冲击最顶峰。之后,税收的冲击力度逐渐趋缓。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图5中,各个阶段税收对经济的冲击几乎都表现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在短期内,我国居民对政府增税的首要反应是大幅度减少消费支出,由此,增税通过影响消费支出进而影响经济使之出现负效应。长期来看,在税收政策实施14—16个月之后,对经济的长期冲击趋为平稳,但是这个平稳值非常惊讶地停留在0值下方。由此来看,我国在各个阶段中,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长期不显著,并且在1994年后实施单一税收增加政策,由此形成较为长期的对消费的负面影响。

由VAR协整检验的数据结果(税收似然比仅为6.58)与图5的脉冲响应实证结果,几乎可以一并印证,我国对于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是较低的。虽然这一结论与目前我国大多数税收政策研究学者的观点可能有佐,但是,它可能更能够从数字的角度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后,税收增长率一直并长期保持高速(超过同期的GDP增长率),显然这对经济来说,可能表现出负效应^⑥。因此,想要带来经济的长期刺激,税收政策或许需要体现减税意图,即让税收政策在24个月之内保持冲击力度。

有趣的是,在比较财政支出冲击曲线(II曲线)和消费支出冲击曲线(III曲线)可以发现,两条曲线在12个月以内几乎走势相同,特别是1985年和1998年中的表现更是如此。这似乎又印证了一个事实: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的消费支出主要是由政府购买或政府投资所驱动。而比较财政政策中扩大财政支出和增发国债的双重效应则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支出,还是增发国债,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均是明显的,并且表现为长期的直至冲击效应的上升。图5中,消费脉冲响应力度不断上升,并在2004年之后愈加明显,直至冲击效应上升到第一位。这说明改革开放后10年,我国政府对财政政策中性的思考及其经验总结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层面,以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意图在逐步得到体现。

2. 各阶段政策要素评价。毋庸置疑,由于VAR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模型均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微观数据,因此,依据以上所得的数据和图表,可以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各个阶段的财政政策及其绩效进行一些综合

性评价。

首先,我们得出 VAR 模型中存在四个协整关系,这是很关键的结果。这说明从长期看,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促进效应,并且一个深层次的表现是:在财政政策中的若干变量之间确实并且能够存在如此多重的协调均衡关系。这实际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各个阶段中,总是希望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干预来实现其宏观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而这些干预使得政策体系中的若干要素轮流成为工具重点,并在各个阶段中反映突出,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刚性。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即 1978 年以后的一个阶段,为促使 GDP 增长,政府经验式地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依赖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其后阶段中,由于税收增加明显、赤字扩大,出现通货膨胀。因此 1985 年后政府采取紧缩政策,但是消费却被抑制,市场出现过剩和疲软的态势。1998 年在政策局势(包括金融危机局势)转变之后,政府又出台积极财政政策。这个政策现在看来,似乎是被动而为,但是由于这一政策的核心组成包括扩大支出、增发国债、调整税收,加之又以工资和社会保障政策相辅佐,因而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绩效突出,各要素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均表现显著,并因其在各个阶段中的组合表现最好而为经济学家和政府所称道。

其次,我国在各阶段的财政政策都体现出较好的绩效,这一点从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模型中也可以看出,即我国财政政策的组成要素较为合理,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之间形成较好的均衡。进一步,它也说明在每一个财政政策的制订和出台时期,我国政府可能对所有的财政手段都加以运用,任何一个财政政策要素都难以得到最优化体现。这或许是因为在政策实际运用中不确定因素较多,制度设计和环境变迁较为频繁。所以我们发现,基于 30 年微观数据得到的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模型中,均没有确实的证据能够充分反映和说明在已经历的若干阶段的财政政策中有最优的均衡出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对财政政策各要素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已获得的 4 个 LR 似然比以及脉冲响应模型中可以看出:短期内,税收政策最快产生经济冲击,税收的变化对消费产生较大冲击并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初始阶段表现为负向扰动,之后衰减,较长时间之后趋向于零。长期中,财政支出和国债支出对经济的冲击始终表现为相对稳定的正向冲击;而消费则对经济也表现出一贯的正向冲击,并在现阶段迅速超越其他要素的冲击效应,模型中的 LR 似然比仅低于财政支出,显示出消费支出的增长是我国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再者,基于经验可以得出,我国在各个阶段均较为重视财政支出工具,这或许是因为财政支出可以直接影响消费,刺激国内需求,调控经济扩张速度。这里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和政府支出最为密切的就是政府收入,也就是税收要素问题的思考。应该说,对于构成政府收入的重要和核心来源而言,我国政

府的考虑角度最早可能是综合性的,但之后却一直表现出单调和呆板的倾向。进入1994年,我国税收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并呈现加速上升之势。税收对经济的冲击效应相当猛烈,然也或有负冲击效果,所以尽管每一次调节税收,但其冲击有效期则比较短暂,因而总体上显现出政策调控经济的若干周期性特征。这样,当政府在调控经济目的可能达不到理想效果时,其唯一的收获和动机就是即便调控目的难以达到,而税收增加的实质性结果却已经形成。当然,在进入2004年以后,中性财政政策成为主流思想,而适度规模税收政策或将成为一个中性的政府主张,减税也可能成为我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之一^⑩。

四、30年历程的分析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VAR协整检验及其经验得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基于三个层面进行,即稳定经济平衡财政;促进经济增长;调节国民经济和协调社会发展。显然,紧缩时期,稳定经济可能表现突出;积极财政阶段时期,经济增长是核心目标;而现阶段,我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内、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政府重在调节国民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上。因此,我国各阶段时期中财政政策的演化路径都是极为清晰和明朗的。另外,还可进一步得出,即便是本文认为税收政策缺乏长期的冲击和响应^⑪,但是这30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总体转型仍然是较为成功和有效的。在误差修正之后,协整检验结果确实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我国每一次新的财政政策的出台往往是针对特殊的经济环境,也就是说,在本文的协整检验模型中,可能对经济环境的考虑不足。例如,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可能出现应用上的争论。改革开放30年是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的经济调控政策也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财政政策的地位和平衡点也在积极寻找之中。其次,作为财政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政策,其独立性似乎太强。即便税收总量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并不算大,但是减税政策的实施方式和途径却较为单一,在本文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中表现一般。这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增税和减税抉择上的两难处境,致使经济调控效率或许降低。再者,我国的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和微观传导机制也较为单一。虽然我国政府非常注重相机抉择原则,但是财政政策实施中的微观环境可能较差,受利益集团或突发事件的影响,地方政府易出台某些微调政策,使得财政政策调控目标趋于失控。此外,我国在财政政策的运用中,虽然非常注重和货币政策的结合,但这也可能使得政策目标有所分散,效率降低。

诚然,改革开放30年对财政政策的理论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但是对于新时期的财政政策,仍须作出一些期待。

首先,要明确和进一步研究政府经济目标和财政政策的动态发展关系。要系统研究我国宏微观经济形势的新趋势、新特点,对财政政策及其应用进行

外围和核心的双向梳理和研究。外围研究要充分体现我国现时代社会、经济问题及其症结所在,深化宏观调控思想;核心研究则要充分认识到财政政策不只是增发国债、扩大支出,还包括调整税收、支持产业升级、增加工资、加强社会保障等多种措施。当然,微观过程需要认识这样一些研究课题,如发行国债应持审慎态度,财政预算须严格管理,财政支出结构应特别重视等。

其次,要充分认识理解财政政策的演化路径。一般而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不仅有财政政策,尚有其他政策手段。财政政策从运行层面上有其自身的演化路径和规律,需要充分认识。这一点从实践中也可反映出来,我国从1979年以后,财政政策路径非常清晰。现阶段,从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型的路径更为明晰,并形成宏观经济的政策要点。演化路径分析上,本文以技术角度阐明了改革开放30年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正向冲击,显示出财政政策确实能够较为长期、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动力,仍然是市场机制中的要素表现,即需求、投资、或是国际贸易或其他,断然不是财政政策。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科学方法论研究上,应有效鉴别和科学理解财政政策的地位,掌控其演化路径,这些都是财政政策能得以高效运行的基本思想前提。

再次,政府应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找平衡点,以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或政策组合治理市场“失灵”,促使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虽然也有政府失灵,但政府对市场的合理介入仍然是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当前形势的一个特点是,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出现罕见的困难,能源经济问题展现无遗。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可能成为定局,我国经济增长也可能放缓。因此,更需要我国政府综合性地利用财政政策,相机抉择,在保民生、保稳定、保能源的原则下敢于面对市场、实施调控,确保中国经济能快速、健康发展。

* 本文受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开放性实验课程校内基金项目资助。

注释:

- ①例如,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样的情况:总是期望政府出台倾向性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
- ②本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经网、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78—2007年。
- ③本文后有进一步的微观分析。
- ④在Mills的检验中,滞后阶数为4,此处选取0—2即可。
- ⑤简单地讲,就是格兰杰定理(Johansen,1999)的运用。
- ⑥这一点也反映财政政策的较长期性特征。
- ⑦基于我国财政政策的表现,文中特别选定1985年、1998年、2004年作为特定年份进行分析,以分别分析紧缩、积极、稳健三个类型财政政策的路径演化。
- ⑧图中统计时间为24个月,显然希望分析财政政策的时滞和反应周期等因素。

⑨也有学者以 Choleskey 分解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结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⑩但是在国内很多学者关于“总体税收增长,结构有增有减”的思想指导下,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的减税可能性存在争论。

⑪显然,这是因为政府充分考虑到我国市场体制并非健全,经济与税收环境远未规范化和法制化,且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等制约因素。因此在实施增发国债、扩张政府支出的同时并未实行减税政策。

参考文献:

- [1]Johansen S.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integrating vectors[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98,12: 231—254.
- [2]Johansen S.Likelihood-based inference in cointegrated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 [3]Johansen S,JUSELIUSK. Testing structural hypothesis in a 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and the UIP for UK[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2,53: 211—244.
- [4]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5]贾康. 我国财政政策的简要回顾与效应评析[J]. 财经论丛,2003,(1):26—36.
- [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寻求更有效的财政政策——中国宏观经济分析[J].经济研究,2000,(3):3—15.

Study on Path Evolution of Fiscal Policy in China and Efficiency Test

——Based on Micro-economic Data and Experienc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DU Yun¹, ZHOU Hong-gang²

(1. Department of Pubic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The laboratory Center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Keynes's economic theories, the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on economic is always a focus of economic studies. The analyses of path and performance of fiscal policy in China help to make researches on macro-economics and optimize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the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79 to 2007 in China, the paper builds a structural VAR model and makes an empirical test on path evolution of fiscal policy and its dynamic effect.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fiscal policy; co-integration test; impulse response model

(责任编辑 许 柏)